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口观

——兼评南亮三郎《人口思想史》

秦仁山

中国的计划生育,不同于外国的计划生育,它导源于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国际上称计划生育为“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指以家庭为单位,计划生孩子数量。中国计划生育,指以国家为单位,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要有计划(马寅初)”。如人口都不能计划,还谈什么计划经济(周恩来)。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计划人口量、人口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对此,我以为似宜简称“计划人口”(英文称Planned Population)60年代的“自由生育”,剥夺了80年代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权利,只好提倡生一个。这是深刻的教训。海外有人说中国接受了新马尔萨斯主义,也搞家庭计划生育。不对,“我们要搞(全国性)计划生育,来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计划生育是共产主义的(1965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的‘全国性’——引者加)”。中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走自己的路。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应当从理论上分清界限。

一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核心

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是积累同工资间的关系,是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资本量和人口两个孤立的“项”。“归根到底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①他还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人受自己产物的支配。这里,马克思要求读者充分理解资本运动对

“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剩”的决定作用。在此,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从而人口量是“因变量”。因为资本为人的“主人”,人为资本的“奴隶”。其实,整个私有制度、私有财产是人的主宰。所谓“财主”不过是私有财产的人格化或代言人而已。第一个提出“私有制必然灭亡”的是一位无名的经济学家,这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的功绩在于把这个“预言”科学化,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所讲的“人口过剩和不足”,是相对于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有机构成”而言的。扩大到整个私有制即任何一种或一国的私有制。当其兴旺时期,感到人口不足,国家需要人,就提倡“多育”;当其衰亡时期,感到人口过剩,国家难治,就提倡“节育”。如我国古代战国末韩非论治国,东汉王充《论衡》,明朝冯梦龙、清朝汪士铎等,皆如是。马克思是讲资本主义人口的相对不足或相对过剩,我以为这一思想适用于整个私有制度。在中国,私有制延续了三千余年,即从人类进入奴隶社会起。这期间私有财产支配人的方式有变化,但本质未变,总是私有财产支配人口。人为私有财产而生存,也为私有财产而死亡,包括自然死亡与战争等非正常死亡。

这里着重说明一点,《资本论》法文版(在德文版八年后出版)是马克思的最后文稿,有其独立的科学价值。在早年德文版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是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基础’”^②在法文版中又说:资本积

①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译本,第657页,着重点是马克思自己加的。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80页。

果的周期变化是人口量变的原因。一些经济学家倒因为果，力图用人口量变去解释资本运动。“这样，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就变成所谓的自然人口规律”^①了。法文版比较德文版，马克思删掉“基础”二字，说明什么？我以为马克思始终不同意离开资本积累过程，孤立地就人口论人口。马尔萨斯所谓的“自然人口规律”并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我们宜跳出人口去研究人口，把人口发展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范畴中去研究，而不是把人口简单放在生物学的范畴中去研究。

另外，史前史，只有两种生产。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产生新的社会分工，出现精神劳动，这些精神劳动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调节着时代思想的生产和分配”。^②我国今天几千万知识分子都是“知识”的生产者和分配者。人类文明时代除了两种生产，还有精神生产。近十年最大的问题是忽视精神生产，从而出现诸多社会问题。只要细读就知“知识增加，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降低”^③。从此看出“三种生产”的相互关系。把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知识生产”三者联系起来，是符合历史唯物论的。8亿农民如都具备小学及以上文化水平，生育率将显著下降。

人类在史前时期主要是寻找“控制食物生产（摩尔根）”的社会，从“人食人”进步到不食人；同时也是寻找有利“人类自身繁衍”婚姻制度的社会，从群婚制进步到一夫一妻制。总之，史前史是人类争取在地球上存在下来的时代。史前史是这样一个“文化阶段”，没有精神生产者。

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阶段进入“文明时

期”，才有精神生产者和出现文字，变成私有制度。私有制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私有财产形式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私有财产奴役劳动者方式的变化。不论哪种变化，归根到底都是私有财产“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因为在私有制中分工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力量，统治我们的物质力量”^④。这种物质力量是什么？恩格斯讲的很明白：“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个还是财富，个人财富是文明时代唯一的目的”^⑤。一切受私有财产的制约，私有财产支配一切。人口发展当然也不例外。不论欧洲人口萎缩、还是非洲人口膨胀，都受私有财产发展规律的支配。马克思同意亚当·斯密观点：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促使劳动人口增加。过去我们召开的几次全国理论会希望按斯大林分类法找出“五种生产方式”各自的人口规律。近两年我以为似需换个分类法，即按原始社会、私有社会、公有社会三种社会来探讨人口规律更为深刻。私有制为了私有财产的“自由发展”，需要自由生育，生育“自由”服从于生活自由。劳动者穷困时，需要多生；经济发达后，不太穷就不愿多生了。非洲穷困，需要多生子女；欧洲富了，就少生了。这是私有财产在支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则属于人类第三个文化阶段，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另当别论。

二 评南亮三郎的人口观

日本南亮三郎（简称南亮）在其《人口思想史》中称，他在1926年就阐明了“马克思关于产业后备军的规律，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相反却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为基础，得出了产业后备军规

① 同19页②，656页。

② 同①卷3，第52页。

③ 马寅初：《新人口论》，第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

⑤ 同④，第21卷，201页。

律”^①这样一个结论，这是对马克思人口理论基本观点的否定。直到1962年《人口思想史》出版，36年间南亮的观点一直坚持未变。这个问题涉及到是否坚持真理，因而有必要一说。

首先，南亮脱离了30年代大萧条时期英国进入“少生少死的时期”这一历史事实，也脱离了日本战后以“生活困苦为出发点，以经济复兴和控制出生率同时并进为特征”，^②实现了少生少死的人口发展规律这一历史现实。可见，历史给马尔萨斯早作了结论。本来马尔萨斯和他父亲辩论中形成的思想，正是拿破仑战争时期，但战后法国的粮食生产“也按几何级数增加了”。^③南亮不会不知这段历史。除了这段历史，还有一次大战后的英国和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南亮总不能回避上述三段历史，闭门于书斋为马尔萨斯杜撰的所谓“人口规律”辩护吧！这是讲历史。

其次，本文着重对南亮引证《资本论》的三段话及其为自己36年前一个“在日本学界引起高潮的大胆结论”而辩护一事，进行分析。既然宣布为“结论”，又轰动日本，足以说明先生的动机和兴趣了。这里仅就先生的“引证”进行分析。且以《资本论》法文版为根据，因为这是马克思最后一稿。

第一段，马克思说：“资本家在这里没有必要进行监督，他可以大胆地信任自由劳动者保存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④南亮自以为从此找到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立足点的真实基础了”。南亮没有辨明是阶级本能还是“生物本能”，就以为理论上胜利了。冷静思考，马克思讲的是阶级社会的本能，不是动物世界的本能。劳动者唯一“本钱”

是全家能劳动的身体；资本家则拥有社会全部私有财产，以为“本钱”。劳动者阶级不多育，拿什么到市场上同资本家进行交换？资本家不“唯利是图”，拿什么到市场上去购买劳动力？两者建立在资本同劳动力对立的基础上，这是表面现象；实质上资本增殖同劳动力增殖具有同一性，是两个“阶级本能”的结合。南亮误以动物交配的本能来说明劳动力被迫增殖，无疑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亵渎，应对自己变成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感到自愧。此其一。其二，南亮回避了私有制剥削劳动者，迫使其多育以留一条生路这一“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产业后备军“立足点的真实基础”。30年代日本人跑到南洋去当“南洋姐”，40年代战后日本军人家庭一度多育，都能说明这是私有制的阶级本能；并非“生物学”的本能。其三，南亮对马克思在法文文版中改“冲动”为“本能是知道的”。我以为马克思可能认为“冲动”仅是个人感情问题；假定这样分析有道理，则“本能”是社会赋予的阶级性问题了。南亮揪住“冲动”一词猛力反击，是错了目标。同时南亮轻率地以工人感情为根据，就证明是马尔萨斯“增殖思想支撑着他的产业后备军学说。”^⑤把马克思删掉的语词作为批判对象。仅此一点，足以证明批判的虚伪性了。

第二段，马克思说：大工业不断吸引和排斥劳动者，形成流动的过剩人口。由于“剥削如此严重（这是南亮最忌讳的，所以笔者特引证在此）”，以致平均寿命缩短。在此条件下，“需要工人一代一代迅速更替。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是大工业工人社会的必然后果）”并榨取童工而“得

① 南亮三郎：《人口思想史》，第180页。

② 日《人口事典》，第126页。

③ 马寅初：《新人口论》，第5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第601页。

⑤ 南亮三郎：《人口思想史》，第178页。

到满足的”。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私有制度下“贫困而多育（非多育而贫困）”的规律求得满足。贫困迫使工人早婚，早婚必早育，早育必出卖童工。贫困条件下的童工必促进早婚早育，甚至非婚生育。就是这种私有制在工人中的恶性循环，使产业后备军不断扩大，而且扩大速度日益加快。在今日的第三世界私有社会中，这种现象越演越烈。它说明三百年资本主义制度一贯如此。对比今日的欧洲、非洲，说明了1830年托·萨德拉著《人口的规律》完全正确：80年代世界人口发展趋势的两极化，一极是富裕少育；另一极是贫困多育。南亮说萨德拉带有生物学观点，不对，这完全是社会学观点。妇女就业，有了独立的社会地位，自然要求少育。马克思只是把萨德拉属于感性阶段的真理变成理性阶段的真理。南亮却想借用布拉达所言：虽然“贫困多育是真的”，但它只不过说明“在悲惨生活下生育才会提高”而已。南亮以为布拉达击中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了。其实，“贫困多育”和“因生活悲惨而提高生育力”是同意语，正好击中马尔萨斯理论的核心。其一，贫困多育不属于生物学范畴；其二，几千年悲惨生活教育劳动者，子女是其仅有的私有财产，绝非“悲惨”同“快活”的一时感情用事；其三，劳动者多育以增加私有财产，这是私有制的规律。南亮先生总是回避私有制。这是不能把问题说清楚的。

第三段，马克思说：停滞的过剩人口同资本家分配给他们的生活资料“成反比例地增长着”。这种社会现象“使人想起某些种类的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数量再生产。”引证到此，南亮断言“这就是马克思为产业后备军提供无穷源泉的根本。”^①需要分析的是：南亮对资本论甚为熟谙，已经明知马克思在“资本积累规律”中说明：

资本家绝不允许工资率超过积累率所需要的限度；因为资本家深知在不饿死人的条件下，微量工资会迫使工人拚命挣扎、为多生育子女而努力。在单个工人无力反抗资本家的条件下，这是工人为保卫自身及其家庭而采取的特殊斗争手段。马克思此处用这种动物现象，不过是比喻资本制度“荒谬”的形容语句。接着把德文本“原注”引入正文，用斯密、兰格二人的论证，足以充分说明自由劳动者唯一可以出卖的私人商品，只剩全家劳动力了。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劳动力越贱，需要子女越多。这才是南亮说的“无穷源泉的根本”。资本家手中许多生活资料堆放在市场上；劳动者没有更多子女去出卖劳动力，这个“家庭”就难生活了。印度实行了近40年计划生育，人口仍每年净增加1700万，等于每年增加一个澳大利亚，总人口现已激增到8.8亿人，这与“动物再生产”毫无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规律在起作用。产业后备军同财富一起增长，要同整个国际市场上看。

从以下三段引证，经逐一分析，没有一段能为南亮1926年轰动日本学界的“大胆结论”提供任何理论根据，相反，却证明《人口思想史》第六章纯属“牵强附会的解释”。理由甚多：（1）欧洲许多国家，尤其德、法二古老民族人口不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是由停滞到下降的趋势；西德、法国曾公开呼吁国民要多育，证明马尔萨斯（下简称“马氏”）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错了。（2）达尔文1860年说：“生物界是依照几何级数高度繁殖的”^②。现代粮食生产技术不断提高，证明马氏粮食依照算术级数增产不对。（3）安川正彬说：马氏讲贫困原因是人口与生活资料不平衡，“这是自然规律”，与社会制度无关；印度雷杰教授1981年在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上说：“亚洲人民贫困

^① 南亮三郎：《人口思想史》，第178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8页。

的根源是财产占有制度”^①。(4)马寅初说：我的《新人口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都能把马氏学说“送到坟墓里去”。(5)据美国人口情报社1977年“世界人口资料表”表明，人口越贫穷，生殖力越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	人口翻番年数(年)
4000以上	300
2000以上	近100
200~400	27~30

高。马氏理论破产了。(6)爱德华兹在《农业展望》上说：“世界人口增长在慢慢下降，近十年人口增长了16%，而农业产量增长了19%。”^②马氏人口超过粮食供应的断言并没有得到证实。(7)1935年3月2日英国剑桥大学纪念马氏逝世100年大会上，除了

① 《人民日报》1981年10月28日。

② 美联社华盛顿1987年9月9日电。

③ 安川正彬：《人口经济学》，第9页。

凯恩斯及其合作者赞成马氏外，“也就没有什么别人了”^③。(8)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970~1979年由25.95%降到11.66%；1986年以后出现回升，但40年仍少生两亿人；世界7%的耕地，养育着世界22%的人口，这证明马氏学说在中国已破产。(9)马氏只研究人类文明阶段，既不懂原始社会，又未料到出现社会主义社会。南亮信奉的是典型的人口决定论，这种理论同战后日本发展背道而驰，南亮违背了研究理论须遵循“逻辑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

综上所述，我认为南亮先生否定了不同社会制度现代人口史；现代社会不同制度人口史却又否定了南亮先生并进而肯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就是本文结论。

(本文责任编辑：杨子慧)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上接第18页)
响。

第三，到1986年，中国的不同类型城镇中，大中城市的失业率下降最快，而小城市和镇的就业问题却严重了，其失业率比全国2.9%的平均水平高，从而加大了上面的影响。

第四，1978年以前，我国人口的收入构成中工资占绝对成份，这时的干部收入要高于其它职业。1978年以后，人口的收入构成变化很大，单是奖金和计件超额工资，1986年总额就是1980年总额的345%，而干部除工资外的收入，一般只相当于同行业其它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平均数。这就减小了干部与其它劳动者的收入差别。在大城市迁入人口中，干部职业比例变化最小，工人职业比例变化

最大。所以，从收入与职业各自变动所产生的结果来看，大城市移民的收入增长量也明显快于其它城市。

第五，长期居住人口中，以务工经商者居多，由于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劳动和服务需求以及商品购买力大于中小城市和镇，务工经商的移民收入也会较高于其它城镇。

上面只是从大城市与其它城市比较中，分析了不同规模的城市移民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状况。虽然不同类型城镇的这种变化程度相差很大，如中等城市和镇的指数分别由0.532和0.430降低到0.447和0.385，但从整体移民来看，它们与收入水平的相关程度仍然加强了。

(本文责任编辑：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